2003

龍勝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政協龍勝各族自治縣
委員會編輯出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龙胜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政协龙胜各族自治县委员会编辑出版

1989年12月

目　　录

我的生平……陈基义（1）

走出黑夜——从旧社会走过来……林志远（9）

我参加革命的经过……宾赐福（43）

镇南夺枪记……廖　炎（67）

在激流里……吕振凡（86）

小江暴动实录……田　玉（96）

回忆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……廖　炎（114）

吴通翰生平简述……陆德高（130）

怀念黄玉斋同志……杨　平（132）

我所了解的阳守敬先生……周亚森（137）

潘内村红瑶碑碣、契约资料……陈维刚（139）

龙胜佛教简述……潘锡葵等（146）

作者来信……苗延秀（147）

吴光球同志撰写长篇革命回忆录《晚春》……焕　青（149）

我 的 生 平

陈基义

我名叫陈基义，化名易之。1921年7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里，侗族，系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人。父母一生从事农业劳动，耕种着二十来亩田地（其中自有田六亩，余为佃耕）。农闲季节，父亲还经营油榨业，抓点经济收入。年成好，可望够饭吃；遇上灾荒年景，要缺两三个月粮食。一家九口，人多劳力少。兄弟姐妹七人，我是老四，男孩是老二，侄儿称我‘客叔’（注1）。

童年时代的我，生性顽皮。在大家族中只怕伯父。祖父家的阿姨讲话结结巴巴，我常爱学她结结巴巴讲话，从中取乐。久而久之，自己讲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，从此沉默寡言，怕人取笑。

我身体很健壮，从小爱劳动，勤学习。小小年纪便常帮家里做事。诸如放牛、割草喂鱼、放养鸡鸭等等。父亲很器重我，说我手脚勤快，又带“口福”。每当劳动之余，父亲常带我下河捕鱼，不管是撒网还是塞汉，从未空手回家。父亲原想让我在家跟他搞劳动，日后接他的班从事农业生产。我八岁那年上平等小学。父亲见我好学向上，学习成绩不错，几乎年年考第一，老师和寨上人都称赞我，于是很高兴，读完初小又让我读高小。

三十年代，世道很不太平。军阀连年混战，龙胜山区也常有五花八门的军队过境。每当军队到来，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逃往深山避难。归来时，便见到寨上被搞得乱七八糟，十室

九空，大家十分气愤。1934年冬，红军长征经过平等，家里人都上山躲避去了，我和维刚叔胆子不小，竟留在寨里想看热闹。我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跟以往的军队一对比，觉得红军是好人。但国民党却大肆宣传，说红军是共匪，杀人放火，强奸掳掠，无恶不作……我听了非常反感。

1936年冬，我在平等中心校毕业。父母希望我从此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母亲托人说媒，介绍对象，要我成家。我对他们说：我才十四五岁，请不要过早为我操心婚事；我感兴趣的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，还是让我找机会去升学吧。次年春，我真的上桂林考学校去了。父母见留不住我，临行前规定一条：只准考公立学校。很幸运，我竟然考取了广西省立桂林初级中学。亲友们都很高兴，支持我，资助我。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赴桂上学。那年月，一个大山沟里的穷孩子，能够上桂林读书，在我们寨上还是少有的。

我在桂林初中学习期间，虽说勤奋好学，但一则因家境贫穷，时时为学习费用耽心；二则自己是侗族子弟，当时对侗语和汉语的差异还没弄清楚，作文、日记里常出现语法及用词方面的错误。故学习成绩仅属中等。1938年秋，因家庭经济困难，筹集不起学费；再加上日本飞机时常轰炸桂林，桂林学校疏散，我们班被并到离家更远的全州中学去。我便辍学回家了。在桂林初中只读了一年半，时间虽不长，但学到的东西不少。除课本知识外，还读了一些课外书，如肖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、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等，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思想。

我辍学的时候，才十七岁。回家后，应母校石校长的邀请，到平等中心校任教师，教高年级的算术、自然课。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，深感自己基础知识贫乏，难以胜任教学任务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39年秋，又报考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，被录取，得到深造机会。

桂林师范，创建于抗战时期。当时，桂林离战争前线较远，相对来说还比较平静。于是，国内许多学者云集桂林。学校便邀请一些知名人士来校任教。如杨诲、丰子恺、戴自庵等，其中还有一些共产党员（后来才知道），如陈啸天、郭文杰、白凤山、唐肇华等。唐老师还担任我们师三、四班的导师。当时，桂林教学设备虽较简陋，但河北省邢台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二三十万册书都寄放在这里，可供师生们借阅。桂林学习空气浓厚。在老师们的启发下，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。除课内学习外，还看了不少课外书。如邹韬奋的《萍踪寄语》和《萍踪忆语》，还有《社会发展史》以及同学们订阅的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群众》等刊物。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。我还参加过校内外的抗日救亡活动，很羡慕解放区，向往社会主义。革命思想的确立可说是在这里起步的。

1942年秋，我从桂师毕业回县。先后在宝地、大同、泗水，平等中心校担任辅导主任、教师、教导主任、校长等职。几年中几乎跑遍了东、南、北区，结识了不少学校师生。

1944年10月，日寇入侵龙胜，县城沦陷。一时百业停顿，人心惶惶，学校师生都回家避难去了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我不愿回家，留在泗水配合国民党南来的一支队伍打游击。不久，龙胜县民众战斗指挥部成立政工队，我和一群教师及社会知识青年应邀前往参加。我被推选为副队长兼军事组长。我们一边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，一边私下积极创造条件，准备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伍。日寇占领县城仅一百天就退出，抗日游击队没有搞成。1945年夏，我离开政工队，先在平等小学当校长，后到龙胜初中当教师。还任过县参议会《民声简报》编

辑。

1942年我离开桂林回乡后，便与北区的同学和青年们，把各自的藏书集中起来，在平等办了一个“可可书库”，由伍权同志经管，供那里的青年借阅，藉以传播革命思想。同时，县城的同学、青年们各自也有不少藏书，大家交换借阅，很受教益。这段时间，我除经常阅读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群众》等报刊外，还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书。如《新政治学》、《新经济学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持久战》、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》以及《西行漫记》等等。从而树立起献身革命的决心和信心。当重庆和谈破裂，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挑起内战，解放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为了寻找党组织，学习革命道理，1947年春，我与廖炎同志（桂林初中，桂师同学）离开龙胜，到桂林育德小学工作。这期间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，蒋管区的许多大中城市，爆发了“反内战、反迫害、反饥饿”的游行，革命斗争情势高潮。7月间，桂北的灵川、全州、灌阳等县举行武装暴动，育德小学陈晃生老师也去灌阳参加暴动队伍。各地参加暴动的不少同志常出入育德小学，育德小学象个联络站，秘密接待过往的同志。连桂北地区地下党特派员肖雷同志也曾在育德小学住过。

在灵川、全州、灌阳暴动受挫后，革命暂时转入低潮。这时，我向地下党提出参加革命的要求。肖雷同志鼓励我回龙胜，以教育工作作掩护，从事地下活动。那年暑假过后，我便辞去育德小学教师职务，以应龙胜县长李芳的邀请为公开的缘由，大昭大摆地回到龙胜。受到了好些同志、朋友的欢迎。回县后，先在县政府教育科当督学，后去龙胜初中任教师，临暴动前又到镇北乡当辅导主任。我遵循肖雷同志的指示，以这些公开职务作掩护，积极从事地下活动。比过去更广泛地接触各

族中小学师生，与他们建立起友好情谊。我结识的朋友遍及苗、瑶、侗、壮、汉各个民族。还跟周大治、吴德忠结拜为兄弟。并深入农村，宣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。

1948年初，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——爱国民主青年会。从此，自觉地依靠组织去开展工作。同年8月，中共桂林城工委决定在龙胜发展党组织，吕振凡、林志远、宾赐福和我先后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。10月间，中共龙胜地下支部成立，桂林城工委派张明同志来龙胜指导工作。从此，党员们和爱青会员们便在龙胜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，一方面继续发展爱青会组织，一方面根据农民协会章程，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和农民协会。并积极调查敌伪武器及民枪存放情况，多方筹集经费，做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。

1949年初，在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，龙胜的地下工作已取得较好的成绩。各族先进青年纷纷投向革命，参加爱青会的近百人，贫苦农民协会遍布东、南、西、北区的侗寨、壮乡、苗岭、瑶村，侗族地区的发动面更广。农民协会会员达两三千人。4月26日，中共龙胜地下支部在金结小学开会，大家认为龙胜已具备了武装暴动的条件。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在龙胜广泛组织游击队伍，开展游击战争，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广西，解放全中国。支部会上还决定由我先在北区拉起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，然后东、南、西区群起响应。支部会后，武装暴动风起云涌，仅半个月时间，全县便组织起约七八百人的游击队伍，根据桂柳区农工委决定，与义宁的队伍合在一起，建立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桂北支队，大家推举我当司令员。从此，这支革命武装便在龙胜、义宁的广大农村积极活动，主动出击，把敌人压缩在县城和几个集镇的点线上。

8月间，上级党为了统一领导，桂柳区农工委指示把这支

队伍划归桂北总队领导，桂北支队番号撤销，义宁的队伍改称十二大队，龙胜的队伍改称十三大队，我任十三大队长，主要活动在龙胜境内。龙胜解放后，十三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龙胜县大队，我被任命为龙胜县副县长，仍兼任龙胜县县大队长。解放初期，县大队配合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在县境周围清剿残匪，我率领工作组深入西、北区边境发动群众配合部队开展剿匪斗争。

回顾龙胜游队，对敌作战大小战斗四十三次，我亲自参加较大战斗有十多次。如广校伏击队、马堤包围战、瓢里歼灭战以及对泗水、和平、篦疏等地敌驻点的攻坚战等。在攻击篦疏的战斗中受过一次轻伤。

1950年5月，我被调去省委党校学习。开学半月，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谢扶民同志找我谈话。他说，中共中南局调广西几个民族干部去工作，指定我去一个。我便服从调动，到中南局统战部民族处工作了四个月。九月间，中南局组织部又让我回广西。回来后，桂北区党委分配我去桂林专署建设科工作。1951年，龙胜酝酿成立民族自治县，当年4月，桂林地委便让我回龙胜任代县长。8月间，在龙胜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我被选为县长。此后，便在县里参加清匪反霸、减租退押及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。1952年10月，桂林地委又把我借调去专署粮食局工作（注2）。1953年4月，仍让我回龙胜任县长。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农村互助合作和生产运动。1956年，在地方干部支援城市建设的调整中，我被调去自治区统战部，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办公室抓行政工作。在这里，跟院领导工作合手；又因自己是个民族干部，去抓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，可说是名正言顺的；同时，我跟各地、县来学习的同志相处亲切。所以，我很安心，工作也得心应手。心想，这辈子就在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院过了，好好地为广西培养出一批批民族干部尽自己职责。四年一晃就过去了。1959年5月，区党委统战部秘书长来民院调我去搞壮文工作。我说，搞壮文还是抽个壮族干部去好些，我不去吧。可是秘书长一星期内连接来几次。我问："是否愿去得去，不愿去也得去？"秘书长说："就是这个意思。调你去壮委是组织上研究决定了的，让你去那里抓行政。还是服从工作需要吧。"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，去了壮委，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。到1960年底，区级机关大批干部下放，民委的好些同志也下放了，我被抽去民委补缺，担任办公室主任。这时期，由于"大跃进"给城市和农村都带来很大困难，1961年春，在桂林地委的三级干部会上，出席会议的龙胜同志联名要我回县，区、地、县的领导同志都到南宁做我的工作，组织上还专门让我去区党校学习。到1963年4月，我第四次回龙胜当县长。我向区党委表示：这次调回龙胜，希望下半辈子（当时我已四十二岁）就让我安心在龙胜干下去吧，别再东调西调了。领导上满口答应，还让我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。回龙胜后，认真贯彻党的"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"方针。由于政策对头，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起来，工农业生产有了起色，人民群众生活有所改善。人民群众高兴，我自己也干得欢。到1964年，困难就基本过去了。1965年秋，干部大调整，我被调去桂林专署任副专员。我拖了个多月，后来还是去了。到地专放下行李，即奔赴"四清"工作前线。

1966年冬，"文化大革命"的旋风已冲击地专机关。12月，我才回到地专机关。这时，一些老地委常委一个个都"靠边站"了。因为我是新上来不久的，还让我参加抓促指挥部工作。1968年《七三布告》发布之后，我受到"监护"审查，被扣上"叛徒"、"特务"、"走资派"、"反革命"等等莫须有的

罪名，直到1974年9月才宣布无罪，解除监禁。

出狱后，我参加地委工作队，分配去临桂、兴安等地搞“三分之一”，历时两年。1977年春，地委宣布将我下放到恭城县轻工局任副局长。1978年底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大庆前夕，眼看中央代表团要来了，才匆忙聘我为自治区政协委员，同时宣布调我回地区文教办任副主任。1979年8月，调自治区民委任副主任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党提倡干部“四化”，我虽说身体好，头脑清醒，但年岁不饶人，到1983年春，我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，即响应党的号召，向区党委申请离休，同年5月获准。但当时我正在区处遗办工作，直到处遗工作告一段落的1985年秋，我才离开工作岗位，来到了桂林的区老干部休养所，在这里欢度晚年。

1986年12月10日，区党委以桂委会(1986)56号文件，为我彻底平反。文件称，‘文革’中对陈基义同志的监护审查是错误的，应予平反；强加在陈基义同志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，应予推倒；为陈基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。”

回顾参加革命近四十个春秋，党、政、军的工作都干过一些。离休前还是历届区人大代表，第一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数十年来，党指向哪里便奔向那里。在党的方针、政策指引下，能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一道工作，一般都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不论分配到哪个岗位上，都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欢迎，临到要调动时，彼此均依依难舍。在龙胜，我是四进四出，前后工作十五年。我很感谢龙胜家乡各族干部群众对我的爱戴和支持，才使我比较好地完成在那里的工作任务。龙胜各族人民，我向您致敬！

述于1989年7月28日

走出黑夜

——从旧社会走过来

林志远

县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派人专程上门约我写点文史资料，实感为难。自己过去没有日记，有点材料早已失散，写起来难免挂一漏万或张冠李戴。但作为龙胜人，喝那里的山泉长大，在许多村寨接过乡亲们的油茶、水酒、糯饭、酸鱼，现在也不能因为老了，就一了百了不认乡亲。为应约交卷，只有回忆个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经历。如能起到与同龄人：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乡亲和战友互通信息，温故知新，能够给后人提供龙胜旧社会和求解放斗争中的一鳞半爪的情况，也就减轻一些内疚之心。

一．我的老家

1925年9月，我出生在三门乡六里。这里是个山连着山，找不出一片能修蓝球场平地的闭塞山冲，翻山就是三江县的金钱隘，清朝时曾在这里设过堡目。解放前的六里有40户人家，25户集住寨上，其余散住四周。壮族15户、汉族25户，其中3户壮族家里有侗族成员。是个以汉、壮族为主的民族聚居村寨。这里的住户都是从外地迁来的。多数来自湖南。因年代已久，与原籍都早已没有联系。林姓共有7户，属于二个宗支，住在寨中心。据说原籍是湖南新化县。迁到龙胜后，曾在寨纳（现在的泗水）、县城、郊坪、鱼寨等地居留过。定居六里至今已有四代，一百余年。二十年代初期以前，全寨只有9户汉

注1（从青年时代起长期在外学习，工作；回家象做客样）

注2（粮食局薛局长调省粮食厅，新局长未来，让我去顶班。）

族和4户共居一屋瓦房的壮族，其余农户都住在茅草房，7户汉族有水田耕种，其余靠开荒种地谋生。最先定居六里的该是汉族，壮族是后来迁去的。不能因为壮族叫‘本地人’，就说壮族先于汉族定居六里。

三十年代中期（即1937年）以前，六里寨子周围和通往外地的山坳隘口都是参天古杉树，常有虎豹，成群的狼和野猪出没伤害人畜和农作物。因此，各户都备有火药沙枪，有两户汉族买有七九步枪。晚上或阴雨天，不敢个人单独出门行走。

由于民国政府支持民众毁庙宇办学校，1932年，六里与三门、大滩共同瓜分三门二圣庙的财产，分得十多亩水田作办校基金，成立龙胜县上西区六里初级小学校。同时成立的还有三门中心小学和大滩初级小学。鱼寨、六秀、下龙、安康、安堇、其洞等村寨都有学童到六里小学来上学，第一年有六十多人，使六里顿时热闹起来。寨上的杨大昌与六里小学第三任校长杨守亮，原籍都是湖南，于是认作本家，以后长期保持来往，使闭塞的六里，开始了与外地的联系。民国政府还提倡种植桐油茶林，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六里满山遍岭的油桐油茶林郁郁葱葱，已进入盛产期。每年冬天，伟江、坳头一带总有几十个姑娘来这里帮工捡茶籽。全屯先后修建起三座水力碾坊，加工榨油。生产的桐茶油主要是自己肩挑到瓢里和三江县城古宜出售，也有宛田、五通和湖南的肩挑客商上门收购。于是，多数农户开始有可靠的经济收入。同时，与外地接触增多了，也扩展了思想眼界，家长们也就比较热心送子女上学读书。这样，生产与文化都得到同步发展。

1949年中共龙胜地下党发动武装起义后，六里寨上有5个青年参加游击队。其中，吴庭玉烈士，原是三江县八江村人，侗族，因父母早亡，跟随嫁到六里的姐姐来到六里，和姐姐姐

夫一起生活，学成油匠。我叔叔林景辉是他的姐夫，我称他舅舅。1940年10月在马海与国民党军的一次战斗中牺牲，安葬在马海；陆秀庭（壮族）原是六漫村人，家里无人而到六里打长工，后参加游击队。1949年11月，部队进军县城途中，走在他前面的机枪手跌倒，机枪走火中弹牺牲，安葬在县城双河村后。

解放初期，六里群众积极交粮油支援解放军剿匪。从未挑担远行的妇女也奋勇背运军粮走25公里送到瓢里。1950年土匪暴乱时，三门瓢里边邻三江县一带逃犯严重，六里有六个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家中的青年男子都参加民兵放哨守卡，配合剿匪部队追捕散匪。妇女们主动打草鞋送给剿匪部队，为部队送饭送水洗衣。还有的妇女背着幼儿跟随区政府工作队出到官家、界口，六漫村寨发动妇女参加剿匪。在学校读书的学生，放寒暑假回家也自动参加民兵跟随部队剿匪。

1970年以前，六里以生产茶油为主，每年向国家交售一万多斤茶油和其他土特产品。以后则以木材为主，连年完成国家采伐计划任务，土特产品也年年增多。1953年修了机耕路，为运木材又修了运输索道。1982年安装了电灯，有了电力加工器械，一些人家用了电饭锅，有了电视机，洗衣机。1976年的教育普查，在城乡中青年文盲和少年儿童失学率上升的情况下，发现六里已基本成为无中青年文盲和儿童失学的村寨。

共产党的领导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使生我养我的六里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也给国家作了不少贡献。

二、少年生活

我父亲林景廷，兄弟二人，读过三年私塾，后来工余自学，有能阅读一般报纸，会写信记帐和写春联的文化程度。他能读书还是因为我祖父不识字，受到欺负而被逼出来的，祖父

青年时家境贫穷，一次，向一家地主借粮度荒，夏借冬还利息加五，重利盘剥。秋后我祖父把收获的桐茶子都送去交还，心里明白还完本息后是还有剩余的，年底就去结帐，希望补回一些钱来过年。谁知债主拿出帐本，装作很客气的样子说："林大哥，你辛苦一年了，今年桐子收成好，你所借的我不催你也送来了，我都记在帐本上，还差几十斤。看到大哥老实讲信用，所差的尾数就不要你还了。"我祖父丁字不识一个，受欺负还得领人家的情，有口难言！只怨自己不识字。因此，祖父咬紧牙关送我父亲去私塾读书。读了三年，我父亲不忍心再让祖父个人劳累养家，便停学回家参加劳动。1932年，父亲同村上另外两位青年发起创办六里小学，（后来坚持办学，都出于这个义愤。1933年冬开始征兵，规定三丁征一，五丁征二，交其村只分派两个名额，本来轮不到我父亲二兄弟。但因为父亲创办六里小学时由于分割三门的庙产与当地产生矛盾，而三门民团局里当权人是原来管三门庙产的人，遂借机报复，指名征调我叔叔去当兵。父亲怕我叔叔年轻不识字又从未出过门，不放心，便替他应征去当了一年兵。退伍回来时六里小学已关门停办。这也是三门那些人搞的。他们说六里不是村公所所在地，不够成立学校的条件，便迁去交其，借用温新记旱碾油坊做教室上课。父亲回来后，又协同交其修建村公所和小学教室，又争得六里小学恢复上课。后来他一直义务担任学校董事和基金保管员以及乡民代表。抗战胜利后，当过一届乡民代表主席。他身体壮实，为人诚实正直，附近村寨的亲朋都很信任他，凡有红白喜事多找他帮忙筹办料理。

1941年我母亲去世，父亲才34岁，带领我们三兄妹过着公鸡带仔般的生活，我是老大，从小就帮着带领弟妹、煮饭、打柴。这对我养成爱劳动的习惯，锻炼适应生活的能力大有好处。

1942年我父亲娶了一位界音山姓侯的、比他小几岁、还怀孕的汉族妇女。我们兄妹和家族看到她很贤慧，又愿来共同生活，从而使家里有人照料，都很喜欢。三个月后，她生了一个女孩，家族们送鸡送蛋，全家相处很好。可是，她父母不准她嫁给壮人，到村上找她大骂，逼迫她到瓢里嫁给一个比她年纪更大的，开客栈的老板做二房。这对我心灵上刺激不小。1944年我父亲又娶了本寨一位姓谢的汉族寡妇。这时，我已外出工作，妹妹已出嫁，弟弟也开始上中学读书，都不在家。他俩日出同起，日落同归，家庭生活和顺上升。可是，我房族两个伯祖父有迷信心理，认为她三十多岁丧夫，命里克夫，会招来不吉利，很不喜欢她，常借端挖苦她。1946年，我父亲挑茶油去湖南城步出卖，回家后得急病，请了一位1944年疏散到龙胜，抗战胜利后在瓢里自开诊所的符南生医生到家来诊视，但因无药治疗，未能挽救，死时39岁。旧中国缺少医药不知误死多少人，我村上没有几个活到六十岁的。此后，家族们更加怨恨我继母，我们兄弟又都不在家，使她感到无可依靠，便离开我家同本寨一位曾与我父亲互认同年的未婚男子结婚。

那时弟弟在中学读书，眼看家里房子已无人看守。迫于无耐，我匆忙托人向家住三门的范玉芬求婚。我们是在春节走亲戚时互相认识的，相识还不到半年。说不准是巧合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天从人愿，她竟无条件地同意了。她既不要财礼，也没办酒席请客。我托几个亲属去接她到六里来就算结了婚。如按照现在讲究大操大办的规格，那我太不讲人情了。然而，历史证明，我们的结合是美满的。四十多年来，为了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岗位上能尽到我们各自的力量，我们有如一对男女混合双打的乒乓球员一样，互相支持，配合默契。现在按年岁已到了寒冬，可是我们的生活仍象春天般的温馨。

1932年，我七岁时上六里小学读书。六里小学是刚创办的新型学校。学校设董事会，负责聘请校长，筹集经费，管理学校。当时校长教师就只一人，第一任朱中校，灌阳县人。第二任石庆杰，平等人，侗族。第三任杨守宽，县城人。他们都是政府委派去的。课程有国语，算术、自然、音乐、体操和美术。教室挂孙中山先生遗像，每周星期一早上上课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周会，由校长领背总理遗嘱。校门口挂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的国旗，每天早上升旗下午放学降旗。升降旗和同老师见面都行鞠躬礼，不再供奉孔子牌位了。

1934年春，六里小学被迫停办，连校长一起搬去交其上课，我也跟校长到交其上学。刚去时，温新记家里一帮娇生惯养的儿孙五、六个人，挽起衣袖裤脚，盛气凌人地蜂涌包围上来大叫大喊：“打山古佬，打壮古佬。”校长见了，连忙跑来把我接进学校。当时我不满9岁，尽管受气也不敢反击他们。后来，温家的老太太和一位同读书的大姑姑，看见我独自住在学校一间房子里，自己做饭，洗衣，自己管理自己，学习很认真，和她那帮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无法无天的儿孙一对比，觉得很可爱，就常邀去她家玩。每逢节日都要叫去她家里吃饭，我不去就送节日食品来，我若不要她们就生气。逐渐使原来围着叫打的一帮男孩改变了对我的凶恶态度，彼此成了朋友。温新记长期在古宜和瓢里经商，家里只有老妇孺和佣人，没有人管教这帮儿孙。他们因不好好学习，后来一个也没有考上中学。其中有两个，在解放后土匪暴乱时参加土匪队伍而被抓获处决。

1936年，我转到三门中心小学读书。当时三门的居民不到20户，有两家杂货店，一家时开时闭的中草药店，一个理发匠。全街长不过三百米，除了阳太荣、阳太珊、阳太礼、大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